派斗争”,55 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群中,很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几乎都是错划的;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又是冤狱。至于“文化大革命”,更使全国上下干部遭殃,学校停办、教育事业瘫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科学文化事业整体断裂。其余像“三面红旗”、“三线建设”等等,留下的也几乎都是烂摊子。回顾 36 年前中国的状况,无论是问题的成堆之多、急需解决之迫切、严重之程度,实在比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更糟糕。

所幸邓小平高瞻远瞩,谋略过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就事论事地拘泥于一个个具体问题,而是首先否定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驱散了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挖掉了斯大林模式的根。全党和全国人民因而重新认识了国家的神圣,明确了国家的根本、基本职能在于强国富民。具体来说就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理论上拨乱反正之后,才去平静地解决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时,邓小平坚持对事不对人。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强调 “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①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和事,通过司法程序处理。这样,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斯大林模式是按照国家法制程序进行,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仍然奉着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去改革斯大林模式。

中苏两国同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由于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起点,就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这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非世界历史性:苏联剧变的重要成因

韦定广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所谓“苏联剧变”,既指共产党丧失政权,也指由此导致的苏联解体。为什么这样一个几乎集中了全部权力的大党、老党及其国家在经历了 74 年的风风雨雨后,却在朝夕之间惨遭此命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在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中时常被忽视,那就是苏共执政中的非世界历史性特征。

“世界历史性”,是马克思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重要概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以世界普遍交往为事实前提,在性质上与地方性或地域性存在相对立,后者意味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仍然处于相互隔绝、闭关自守状态。如果这样,那么共产主义非但难以避免贫穷甚至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且还只能“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② 综观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执政可以说成也在斯大林模式败也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既具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十年国际经济、政治的重要反映;不但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思想文化、性格特征的烙印,而且也代表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共产党类落后国家执政的共同特点。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基本取得共识的分析来看,③非世界历史性应该是其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1 页。

② 引文及基本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 87 页。

③ 目前国内外对斯大林模式在体制方面主要特征的概括,主要有下述九种:超级集中或超级集权体制;行政命令体制;兵营式保守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专横官僚体制;战时体制;极权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陆南泉等人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从三个方面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高度集中、军事性和封闭性。(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5 – 466 页)

容忽视的本质内涵。

非世界历史性首先表现为执政的整个指导思想及其方式具有强烈的封闭色彩。一是内部性封闭，也就在高度集中的统治框架内，各部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缺少交往、沟通与流转。例如在经济领域，一切都是由“上面”说了算，“长官”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古比雪夫曾经如此评价经济计划化所达到的程度：“在我们的计划制度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致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文化或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之外和在计划工作范围之外。”①在这种状态下，整个社会如果要说有交往，一般也只能发生于上、下之间，而横向性的，即在个人、企业、部门、地区之间的交往则是不存在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化相并存的，必然是内部的高度分割与孤立。二是外部性封闭。由于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立当作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导致苏联时期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苏联自己坚决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深层次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同时还不顾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要求，竭力将“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建成一个自我孤立、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②

非世界历史性的第二方面表现，在于片面强调东西方对立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拒绝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必须以人类一切文明成就特别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最先进文明成就为出发点，这本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从文明角度衡量，苏联无论共产党执政还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都面临“先天不足”困境，列宁也曾经想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就来补上这一课，并且将那种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称之为“中非居民心理”。③ 后来是斯大林改变了这一切。执政中暂时的成功以及工业化建设成就，极大地影响了苏共高层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方面盲目自大，觉得苏联在文明方面（无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还是文化水平）已经完全超越了资本主义，同时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日渐加深、崩溃在即。另一方面两大阵营的对立凝固化，尖锐对立或对抗不但体现于军事和经济，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全盘否定资本主义（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并且提出了打垮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结果导致对西方优秀文明、对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现代化成就的排斥和毁弃。

应该承认，斯大林模式的非世界历史性本质既不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也是对列宁晚年有关苏维埃俄国政治、社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严重背离。其成因较为复杂，大体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

在客观上，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环境的“压迫”相联系。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建设和发展始终面临着险恶国际环境的影响。虽然 20 年代初经过列宁的努力，一度出现过改善的迹象。但在 1927 年 5 月，英国再一次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同时中止 1921 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以图进一步从政治上、经济上孤立苏联。同年 6 月，英国又发起美、法、德、意、日六国外长会议，提出“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30 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曾经给苏联提供过进入国际社会的机遇。然而面对苏联的崛起和战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起初是美、英出于自身国际战略利益考虑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争，觉察到有重新遏制和封锁苏联的必要。1946 年 3 月 5 日，已经离任下野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发表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率先发出对苏联展开冷战的信号，接着就有以称霸全球为目标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再就是 1949 年 4 月，美、加、英、法、意等 12 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一系列冷战攻势，苏联理所当然地要采取相应措施。而 1955 年 5 月成立华约组织，更加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对峙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的色彩。

然而，这种外部环境在当时也并非绝对不可打破。例如，西方曾经接纳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和

---

① 《古比雪夫言论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3 年俄文版，第 226 页；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第 469 页。

② 例如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曾经想参加“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你们参加会议（指西方国家研究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会议），你们就会用行动来证明你们甘愿充当反苏的工具。”（《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3 页。）

③ 有关这方面详细论述可参见韦定广：《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 章第 4 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最后都没有参加。另外,"马歇尔计划"最初并没有将苏联排斥在外。① 这就不能不牵涉到苏联共产党执政导致非世界历史性的一些主观因素。

在主观上,首先与"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列宁始终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与世界革命相联系,新经济政策进行对外关系调整,目的是为了确保苏维埃俄国能够在西方的包围和封锁下获得"生存"和巩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范围内取得最终胜利的第一人,应该是斯大林。② 1946 年,在二战后不久,斯大林即明确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③且不说"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在理论和事实上是否能够成立,这种过于强烈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优越感不但引起以丘吉尔、杜鲁门为代表的西方反共势力的警惕,而且培养起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骄傲自满情绪。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世界文明的最高成就,其制度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其力量摧枯拉朽、排山倒海。受这种认识支配,必然产生如此思维定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壁垒分明、"划江而治"的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因免受资本主义的侵蚀而最终获得全面胜利。

其次,在于苏共中央高层长期对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科学认识。现代化即社会全方位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无论其建设过程还是目标实现,都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密切交往与相互借鉴。哪怕最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现代工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同样道理,市场也应该是开放,只有充分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生产潜力,从而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共同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成果不但是确立了一个固定的汇率体系,而且是建立起世界性多边贸易秩序的基础,从而使 30 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得到有效克服,全球很快进入国际贸易"黄金时代"(1950 – 1973 年)。然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不但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在"经互会"范围内就"能够找到足够的一切"。这充分暴露了苏联执政当局对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认识的严重不足甚至无知。

同时值得指出的,非世界历史性的形成也和斯大林及其他高层领袖个人在素质修养上的缺陷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不能也不应该将社会实践中的弊端甚至失败完全归咎于领袖的个人品质或素养,但在 20 世纪共产党执政史上,也不能忽视这方面因素对于执政的严重制约。与列宁相比较,斯大林及以后的苏共领导人(或许戈尔巴乔夫稍有例外)明显缺乏对西欧现代文明的深刻了解和感受。

非世界历史性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及其事业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对国际市场的利用。二战后全球化的新发展,突出表现为世界跨国经济发展异常迅速,规模空前扩大。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不但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度,而且对本国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拉动作用。相比之下,苏联则明显表现出不足。体现在出口系数方面,世界出口系数在 1950 年为 8.5%,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 7.7%,到 1980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 17.1% 和 26.8%。而同期,苏联及东欧国家只从 4.6% 增长到 9.3%。④ 出口水平上不去,无疑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构成严重制约。问题还在于:将主要对外经济联系与交往限制在"经互会"范围内,非常不利于苏联整个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苏联共产党出于和西方国家抗衡的战略意图,竭力将经互会国家圈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范围内。但是由于又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作怪,"老大哥"对这些"小兄弟"并不能够平等相待。一是经常将劣质工业产品推销给成员国,二是大肆进行价格差价掠夺。结果不但阻碍了其他经互

① 参见王斯德《世界通史》第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8、153 页。

② 有关斯大林这方面思想发展的详细过程,参见赵家祥《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哲学研究》1998 年第 10 期。

③ 《斯大林文集》(1934 – 1952),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2、510 页。

④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1 页。

会成员国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并且使这些国家对苏联怨声载道，逐步表现出离心离德的趋势。

或许非世界历史性对苏联所产生的更深刻、更加致命性的影响，还在于政治文明领域。对于这方面的负面作用，当然难以像对经济那样进行具体化甚至数量化的阐述，但事实上肯定是存在的。封闭和孤立，不但造成苏联时期的政治建设不能够像马克思、列宁所要求的，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为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残余提供了得以继续生存的土壤。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大党主义和体制的僵化、老化，思想文化领域的个人崇拜、高度的思想垄断等等，实际上都与因长期封闭而缺少与世界先进文明的交往存在着直接性的因果联系。长期封闭以及与世界相隔绝，一方面是阻碍发展、保护落后，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共产党执政中的“温室效应”。二战后期，一大批苏联红军随着战争进程走出国门，在接触到欧洲先进国家的文明成就和生活方式后，立即就产生了对国内状况的不满情绪。他们普遍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并形成改革体制、革除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合理状况和弊病的冲动。这股改革愿望最后当然没有变成具体的行动，但由此也表明了封闭、孤立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极端脆弱性特点。80 年代中后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微波和卫星系统取代电缆，通信及大众传媒业极度发达，文化全球化无论在量还是质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像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所指出：“20 世纪晚期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在地理规模、直接性和速度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技术，而且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制度化（其中的许多技术形式逐渐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和社会空间）。”①150 余年前，马克思在谈到鸦片战争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文明冲击时，形象地告诉人们：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方式，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一旦这种条件不复存在，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社会解体过程，其情形正如一直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一样。苏联的情况自然并不完全等同于 150 年前的旧中国，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自由化”之后，随着“西风美雨”纷至沓来，其过程性质就像马克思所形容，长期处于封闭、隔绝状态中的“温室社会主义”立即呈现出现风化瓦解之势，由此而至的必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彻底失败以及苏联作为国家形态的完全解体。

苏联剧变的民心基础坍塌分析*

黄永鹏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无论是对于古今的集权统治者还是现代民主国家都是统治者执政的基础。民心向背关乎每一个执政的政治集团的生死存亡。中国战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孟轲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②回顾苏联剧变事件的发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执政的民心基础已经彻底坍塌。

一、营私舞弊、各谋私利，党政干部沦丧公心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被苏共奉为意识形态教育经典的

①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7 页。

② 《孟子·公孙丑下》。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苏共意识形态管控政策的失误与苏共败亡”（项目编号：07JA710024）。